

马幼垣 著

靖海澄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论

下 册

中华书局

马幼垣 著

靖海澄疆

——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新论

下 册

中华书局

目 录

自 序	i
参考资料简称表	1

清季篇

鸦片战争期间的侵华英舰	3
奥意利萨海战及其对北洋海军黄海海战布阵的影响	23
亨利华尔代沪所购美制舰考	33
刘步蟾和东乡平八郎	
——中日海军两主将比较研究四题	47
詹天佑曾否参加甲申中法海军马江战役问题平议	89
北洋海军“平远”舰考释	115
中日甲午战争黄海海战新探一例	
——法人白劳易与日本海军三景舰的建造	171
北洋海军送舰只往长崎入坞怎样看也是极度愚笨之举	
——敬答孙建军先生	191
马吉芬与北洋海军	231
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谋速购外舰始末	253
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革新海军的尝试	
——以向外购舰和国内造舰为说明之例	339

民国篇

抗战期间未能来华的外购舰	381
--------------	-----

汪伪海军舰只初探	403
灵甫舰	
——流落异邦的中国海军孤儿	451
香港篇	
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助守香港始末	465
与香港光复有关的两个海军问题	477
评论篇	
大陆上的中国近代海军史研究, 1949-2000	535
参考书目	569
人名索引	637
舰船名索引	645
特别名词索引	667
后 记	677
再后记	679
又再后记	681

民国篇

抗战期间未能来华的外购舰

一、背景

自民国肇造至北伐战争结束，除广东海军偶乘近水楼台之便在香港订购些吨位很有限的小舰艇外，中国并没有添置外购舰。民初新增的英制舰“肇和”（见图52）、“应瑞”（见图51）、日制舰“永丰”（后易名“中山”）（见图55）、“永翔”（见图54）、德制舰“建康”、“豫章”（见图50）、“同安”、“江犀”（见图53）、“江鲲”都是因北洋政府支付宣统年间清廷大批订购外舰所欠余款而得来华者（因欠款和欧战等因而终不克来华者，尚有美制舰“飞鸿”（见图56）、奥制舰“龙湍”（见图57），和意制舰“鲸波”（见图58）。它们理应视为满清遗物¹。

这段时期所以没有向外购舰，并非由于无此必要，而是因为内战频仍和列强禁售²。

待北伐功成，国家一统，表面上虽解除了前此无法订购外舰的障碍，然舰队分属不同沿海地区政权的情况尚存，各区执政者视海防建设为巩固派系政权手法

- 1 自甲午战争结束至民国肇造订购外舰的情形，见马幼垣，《甲午战争以后清廷革新海军的尝试——以向外购舰和国内造舰为说明之例》，《岭南学报》，新1期（1999年10月），页501-538（此文收入本书）。
- 2 有关背景，曾金兰，《沈鸿烈与东北海军的建立》，《国史馆馆刊》，新15期（1993年12月），页127-128，有扼要说明。至于列强禁售，可参考陈存恭，《从贝里咸合同到禁助中国海军协议》，《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5期（1976年6月），页369-407；陈存恭，《列强对中国的军火禁运（民国八年—十八年）》（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页122-125，156-158，166-168；王正华，《抗战期间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页18-20。

的心态仍在，故自北伐成功至抗日军兴的十年间，订购外舰的活动还是受客观环境所牵制³。简言之，这段时期向外国订购而值得一谈的舰只，在数目上，给中央特意栽培，直属军政部，而不受海军部管辖的电雷学校囊括了泰半。得不到中央信赖的中央海军经常支绌，除了例行公事地屡向中央提出冠冕堂皇，而难免不成泡影的建舰计划外，尚能添造些简单国产舰和改建若干旧舰，已算很不错的成绩了⁴。期望中央海军广添昂贵的外购舰是不切实际的。

这段时期向外订购而在卢沟桥事变前建成本来的舰只，全数投入抗日战争。这是理所当然之事。这些舰只的战迹在近年刊行为数不少、且有愈出愈厚趋势的中国近代海军史专书中，虽有叙事详略之别，基本纪录可说已备。需要补充纪录的是订购了却始终没有东来的舰只。

二、未能来华外购舰纪录的陋误

这些未能来华的外购舰研究起来是一个史料贫乏、异常棘手、使国内治史者难以交代的问题。困难的程度，不妨用两本抗战期间所出的官方报告和四本近年的专著来说明。

海军总司令部编著的《海军战史》（重庆：海军总司令部，1941年），和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编的《海军抗战事迹》（重庆：海军总司令部编译处，1944年）是抗战期间出版的两本重要官方报告。不同的体例使两书用起来可互补长短，扩大涵盖的范围。但两书均只字不提未能来华的外购舰。

研究自民元至四十年代末期的中国海军，海峡两岸近年出版了四本不可或缺的书。

海军史专家杨志本主持编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北京图书馆等处

3 这十年间海军发展的大势和有关政治背景的分析，见张力，《中国海军的整合与外援，1928-1938》，收入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建党革命一百周年学术讨论集》（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册2，页444-474。至于这十年间的建舰成绩，见姚开阳，《黄金十年的国府海军建设》，《全球防卫杂志》，153期（1997年5月），页78-85。

4 中央海军的无奈和无助，见苏小东，《抗日战争中中国海军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1期（1996年2月），页92。

的史料（特别是档案），刊为厚达1,208页的《中华民国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年）（简称表作《民国海军史料》），给没有机会亲检大陆所存原始史料的研究者很大的方便。

与杨编相辅的陈书麟（1907- ）、陈贞寿合著，厚645页的《中华民国海军通史》（北京：海潮出版社，1993年）。抗战部分约占全书百分之十二。

中国海军司令部编著，厚1,254页的《近代中国海军》（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简称表作《近代海军》）是目前整体讲述自鸦片战争至1949年底海军史事最详细的专书。按此书涉及范围之广，抗战部分占四十多页的篇幅，并不算少⁵。

讲述抗战时期的海军史事，上列五种新旧书籍在详细程度上都远远比不上柳永琦编著，两厚册，共2,807页的《海军抗日战史》（台北：“海军总司令部”，1994年）（简称表作《抗日战史》）⁶。

这六本书合起来，虽未必尽用了抗战时期的海军总司令部、现在两岸的海军部，以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北京图书馆等机构所有的资料，但它们处理的问题巨细靡遗，恐怕忽略的与遗漏的资料也少之又少。卷帙浩繁的这六本书合起来，讲抗战期间未能来华的外购舰，竟只有孤伶伶的一句话，而且是误信传闻的错话，简直难以置信。这句话见《近代中国海军》，页921（不在抗战的一章）：“电雷学校向英国订购的两艘快艇母舰‘戚继光’和‘谭伦’号，也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能接收。”这句话既简略又错误（详下文）。

如果说研究者因史料贫乏，无法确述外购舰不能来华的经过和原因⁷，当事人的回忆录该可以为有关史事保留梗概。然而，当事人的回忆录竟有出现胡说八道的情形（下引周应骢的话便是一例）。

单凭知存的中方资料，看来不易说明外购舰不能来华是怎样一回事。幸而西

5 此书的重点在清季，较简略的民国部分（包括抗战时期）是可以写得更详细的；见张一文、皮明勇，《评〈近代中国海军〉》，《历史研究》，1996年4期（1996年8月），页162-170。

6 此书体例特别，既是论著，又是史料集，见张力，《柳永琦编，〈海军抗日战史〉》，《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期（1995年3月），页124-126。

7 上述六书以外，还有可能为目前讲中国舰船史唯一专书的唐志拔，《中国舰船史》（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年）。此书亦不提抗战期间外购舰未能来华之事。

方资料尚不算太零散，倘试为综合，史事轮廓还是可以整理得出来的⁸。

三、卢沟桥事变后始来华的英制鱼雷快艇

首先应说明，抗日战争的开始并没有终止在欧洲订购的舰只东来。电雷学校向英国订购的鱼雷快艇（motor torpedo boat），晚至1938年初仍有一批六艘于建成后运抵香港⁹。

这些英制鱼雷快艇的基本数据为排水量（基准？）14英吨，长55呎，宽11呎，吃水3.5尺，马力750匹，最高时速40浬，续航力300浬，备单装18吋鱼雷发射管二个，双联0.303吋机关枪二组，深水炸弹二个¹⁰。

这六艘鱼雷快艇抵香港时，淞沪、江阴、南京已相继失守。香港政府以战事为由，把这六艘鱼雷快艇扣押起来；后来港府买下两艘，放行四艘。那四艘经粤汉铁路陆运抵武汉后，编号“颜五三”、“颜九二”、“颜一六一”、“颜一六四”，合称为颜杲卿中队（颜杲卿，692-756，唐将，书法家颜真卿从兄，为安禄山所杀）（见图60），立刻投入战事（电雷学校在这段时间奉命解散）¹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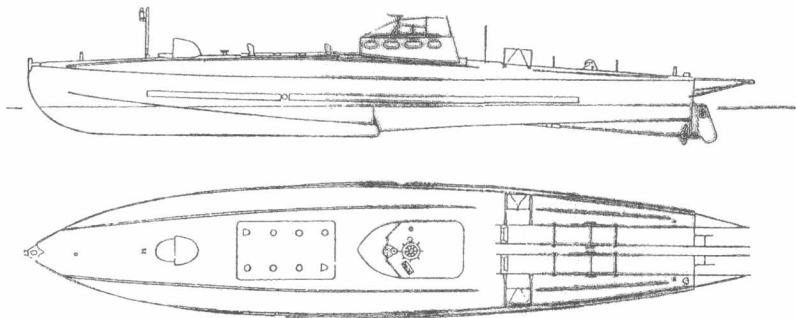
8 记述三十年代中国向外订购，不管最终能否来华的舰只，以Andrew Smith, "On Chinese Naval Vessels Ordered from Foreign Builders during 1936-1941," *WT*, 15:2 (June 1978), pp. 155-158, 最简明准确（虽仍有错误）。本文即以此为基本参考，引用此文和更正其错误之处，为免烦复，不逐一注出。

9 中日开战前，电雷学校已置备欧制鱼雷快艇十一艘：（一）岳飞中队德制鱼雷快艇三艘——“岳二二”、“岳二五三”、“岳三七一”。（二）史可法中队英制鱼雷快艇四艘——“史三四”、“史一〇二”、“史一八一”、“史二二三”。（三）文天祥中队英制鱼雷快艇四艘——“文四二”、“文八八”、“文九三”、“文一七一”，见马幼垣，《海军与抗战》，《联合文学》，105期（1993年7月），页171-172。抗战期间的前半（1937-1941，即香港尚未沦陷以前），香港是中国向外购买军火最重要的入口站。其间的外交背景，见Lau Kit Ching Chan陈刘洁贞，“Britain and the Sino-Japanese War: Arms Traffic to China through Hong Kong, 1937-1941,” *Asia Quarterly*, 1977, No. 3 (1977), pp. 175-202. 但该文只管外交，究竟什么军火（类别和数量）经港运入则全不交代，故本文所讲由港内输的舰艇，该文均没有提及。

10 A. J. D. North, *Royal Naval Coastal Forces, 1939-1945: MTBs, MGBs. MA/SBs, MLs and HDMLs* (London: Almark Publishing Co., 1972), pp. 10-12; Paul J. Kemp, *British Coastal Forces of World War II* (London: ISO Publications, 1997), p. 6.

11 马幼垣，《海军与抗战》，页182。

电雷学校颜杲卿中队英制鱼雷快艇型线图



留在香港的两艘，在对抗日军于1941年12月犯港的战事中颇起作用（驻港英海军力量异常单薄，两艘鱼雷快艇在数量上已占很高的比例）。其中英海军编号为MTB27的一艘更建奇功。因此，这批英制鱼雷快艇尽管有两艘在运抵香港后未北上编入中国海军行列，却不能说它们仅有四艘来华，更不可说它们并没有悉数负起抗日的使命¹²。

真的未能来华的外购舰数目其实还是不少，讲述起来也不简单。

四、中央海军订购德国潜艇

事情得从1936年底西安事变结束后说起。那时因国民政府的剿共行动已告一段落，抗日的准备工作随而转入新阶段。

1937年2月，长期领导中央海军的海军部长陈绍宽（江南水师学堂驾驶班第六届），[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留学英国，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日德兰[Jutland]英德海战）（见图3）受令速建潜艇后，拟向北伐以来长期军事援助中国（尤其在人员训练方面），且于1935年成立合步楼公司（Handelsgesellschaft für Industrielle Producte工业产品贸易公司，简称Hapro，故有“合步楼”之称）去处理对华军售的德国订购这类舰只¹³。1937年春夏间，陈绍宽和他的得力助手周应

12 有关细节，见收入本书的《抗战期间中国海军助守香港始末》一文。

13 马振铎，《抗战爆发前德国军火输华评述》，《民国档案》，1996年3期（1996年8月），页76-85，是研究德国对华军售背景的佳作，谈论订购海军舰只部分则嫌笼统。

骢（1900-1985，烟台海军学校第十三届，1921年经由吴淞海军学校深造毕业）随孔祥熙（1880-1967）特使团赴欧，进行采购事宜。原先计划在德订购五百吨远洋潜艇一艘、二百五十吨近海潜艇四艘，和潜艇母舰（submarine tender，又作submarine depot ship）一艘。其后真正拨款（一千万马克），因而启工者仅二百五十吨级的潜艇两艘；第一艘订明1938年底完工。但启工（即安龙骨），以及陆续派员赴德监造和接受潜艇训练都是卢沟桥事变后之事¹⁴。

卢沟桥事变后，中德两方面都发生剧变。中国的中央海军在事变后沿长江节节西退。事情的大略，前述六书均有说明，不必再讲。德国则一面与长期侵略中国的日本关系愈来愈密切，一面又为自己在欧洲的野心积极备战。除了这些间接原因之外，还有厂方为此二潜艇准备的器材不断被德国政府征用等直接原因，使建造工程进展得很慢。德国终于在1939年9月1日通知我国（早过了第一艘潜艇的预定完工期），那两艘尚未下水的潜艇由其海军部接收，已付之款愿意退还¹⁵。

这两艘德国编号为U120和U121，属Type II级B型（同型共二十艘，中国订购者外为1935-1936年间建成的U7-U24）的潜艇之主要数据为长42.7公尺，宽4.08公尺，高8.6公尺，水面排水量279公吨（274.6英吨），马力700匹，最高时速13浬，续航力1,800浬/时速12浬；潜水排水量328公吨（322.834英吨），马力360匹，最高时速7浬，续航力35-43浬/时速4浬，潜水最大深度150公尺；备53.3公分（21吋）鱼雷发射管三个（全装在舰首），配鱼雷五枚或水雷十八个，20公厘/30高角机关枪一挺（备弹1,200发）（见图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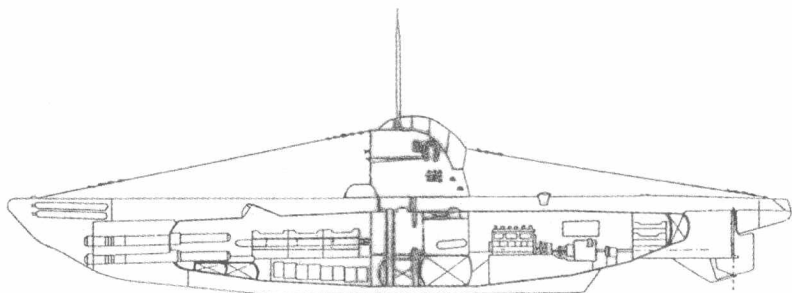
这两艘潜艇分别在1940年4月和5月建成，上距下水日期均仅月余，相当神速，可见在自订购至德海军部收回的两年时间内，建造工程实在难说成绩。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两艘潜艇均留作训练之用，并未参加实际作战。1945年5月2日，U120在德国北海海岸的不来梅港（Bremerhaven）自沉；同日，U121也在不来

14 启工日期虽尚未见纪录，但因陈绍宽等1937年6月9日始抵柏林，待签约已是一个月后之事，而陈绍宽于事变爆发后即返国，加上签约后还有付款和厂方准备建材等阶段，故潜艇只可能在事变后一段时间才启工。陈绍宽抵柏林的日期，和订购潜舰的经过，张力，《中国海军的整合与外援》，页463-465，有详细考述。此外还可参考关德懋，《抗战前夕孔特使团访德之前因后果》，《传记文学》（台北），47卷1期（1985年7月），页69-75。

15 两潜艇建造期间所遭遇的种种困难，见张力，《中国海军的整合与外援》，页465。

梅港附近的威蒙德军港（Wesermünde）自沉。1949年10月，德国政府加以打捞，历时约一年，终于成功，然后出售解体¹⁶。

U120、U121潜艇型线图



这次没有结果的订舰对明瞭中央决策阶层的判断能力，以及中央海军的处境和能耐，都很有显示作用。

先说中央的判断能力。卢沟桥事变后，沿海虽没有全线陷敌，但中国已无制海权可言，中央海军即采以旧舰沉塞江阴，余舰沿长江西退之策，而抗日又非短时期能望有结果之事。按理任何人都明白从自封江阴起，晚来的外购舰，除了小型鱼雷快艇还可勉强经铁路运往战区外，都成了无法与尚存的海军舰只会合的废物了。本来就极难在内河活动的潜艇，情形只会更糟。

陈绍宽甫因卢沟桥事件突发，自欧赶回来，便立刻定出封江西退之策。他不

16 这两艘潜艇的数据及其经历，见H. T. Lenton, *German Submarines* (London: Macdonald, 1965), Vol. 1, pp. 27-28, 36; J. P. Mallmann-Showell, *U-Boats under the Swastika: An Introduction to German Submarines, 1935-1945* (London: Ian Allan, 1973), pp. 92-95, 101; Anthony Watts, *Axis Submarines* (New York: Arco Publishing Company, 1977), pp. 17-18, 22; Erminio Bagnasco, *Submarines of World War Two* (Lond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77), p. 60; Eberhard Rössler, *The U-Boat: The Evolution and Technical History of German Submarines*, Translated by Harold Erenbreg (London: Arms and Armour Press, 1981), pp. 334-335; GJM, Volume Two, pp. 39-42; Axel Niestlé, *German U-Boat Loses during World War II*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98), pp. 31-33; Gordon Williamson, *Kriegsmarine U-Boats, 1939-45 (1)* (Oxford: Osprey Publishing, 2002), pp. 8-9; Eberhard Möller and Werner Brack, *The Encyclopedia of U-Boats: From 1904 to the Present Day*, Translated by Andrea Battson and Roger Chesneau (London: Greenhill Books, 2004), p. 66.

会不明白此策会使尚未来华的外购舰变成废物。那时上距签约造潜艇不过几天，尚未付款，更谈不上启工，为何不干脆终止合约？纵使要罚款，也强胜拖泥带水地弄下去。事情结果拖了两年多，白白浪费资源，到头来还是由德国主动废约。中央之没有当机立断，虽然与中央海军没有提出终止合约的要求有关，但中央决策阶层的判断能力差也不是代辩。

至于解释中央海军的处境和能耐，得从这支海军的背景说起。中央海军原属北洋军阀政府，北伐期间掉转枪头，协助国民政府北伐。其后国府与辖属海军部的中央海军之间总是隔阂重重，互不信赖，遂致从北伐战争结束至抗日军兴，中央海军之订购外舰仅成功地买得一艘2,526吨的日制“宁海”号轻巡洋舰（1932年建成来华），而向欧洲国家订舰就只有这不仅是流产，还是任由卖家摆布的一次。

说这次交易任由卖家摆布，因为那两艘潜艇压根儿是失败的实验品。

IIB型是适航性和灵活性都很高的优质潜艇。德国在接受陈绍宽的订单前，已为自己的海军造了十八艘，各艘之间并无显著分别。至此，德人已无意再添造这级潜艇。舰式的淘汰并不改变那十八艘已建成者是优质潜艇的事实。德人建造此级潜艇既经验丰富，循成规再造两艇，品质应可保证。德人却要利用多造两艘卖给中国的机会去做新实验，大肆更改司令塔的设计，以致弄到U120和U121的适航性极差，完工后几成崭新废舰¹⁷。难怪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德国海军虽左支右绌，仍不放心让这两艘问题舰上前线¹⁸！其他十八艘早建成的姊妹舰全不是这副窝囊相，多年优良服务的表现使德人用起来充满信心，艘艘上阵外，其中十五艘还有毁伤盟军舰船的战绩（仅U8、U11、U12三艘无成绩可言）¹⁹。

查检德人制毕自用的最后一艘IIB型潜艇（U24）至再采此型款来替中国造两

17 上注所引Mallmann-Showell, *U-Boats under the Swastika*, p. 101, 特别指出U120和U121因司令塔设计错误而带来的严重后果。

18 Clay Blair, *Hitler's U-Boat War: The Hunters, 1939-194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6), pp. 178-179.

19 Jürgen Rohwer, *Axis Submarine Successes, 1939-1945*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1985), pp. 1-18, 214, 218-222. 这十五艘潜艇当中，以U23毁伤盟军舰船达二十艘之多，战绩最惊人。

艘，两点之间曾为自己添建些什么级别和型款的潜艇，便可知复用IIB型款时，该型款已落伍至何程度：IA型，U25-U26（1936年，水面排水量862公吨[下列者均为水面排水量]）；VIIA型，U27-U36（1936-1937年，626公吨）；IX型，U37-U44（1938-1939年，1,032公吨）；VIIB型，U45-U55（1938-1939年，753公吨）；IIC型，U56-U63（1938-1940年，291公吨）；IXB型，U64-U65，U103-U111（1939-1940年，1,051公吨）；IXC型，U66-U68（1941年，1,120公吨）；VIIC型，U69-U73，U77-U82，U88-U98（1940年，769公吨）；VIIB型，U73-U76，U83-U87，U99-U102（1940-1941年，753公吨）；XB型，U116-U119（1941年，1,763公吨）。前后共涉及九个型款九十二艘潜艇（U112-U115的编号没有用过），悉较IIB型产品新颖²⁰。

陈绍宽和周应骢在选择潜艇型式前显然没有好好做功课，遂让德人有机可乘。虽因困于资料，很多重要问题现在无法解答（如陈绍宽有多少选择舰式的自由？德人在改变设计前有无征得陈的同意？德人是否更改了蓝图才出示给陈看？陈知否所订两潜艇与德人自用者有大别？若知有大别，有无抗议？德人有无说明对实验有多少把握？），摆在眼前的事实却很简单。假如按原有设计去造，这两艘潜艇就必定是优质品。陈绍宽要是知道以前那十八艘是不必更动设计，服务以来表现优良的佳品，就应强烈责问更改设计的理由，和德人不更改以前那十八艘的理由。这不是说优质品不必改良，但这级潜艇的建造情形实在教人怀疑德人对这项实验究有多少把握。为何这实验不在建造那十八艘时选任何一艘来做，不在其他发展中的潜艇型式上做，而偏选在代中国建造舰式已属淘汰的两艘上做？得不到满意答复，就不该签约。假如陈绍宽对世界海军情况有足够的认识，当知德人在造完自用的最后一艘IIB型潜艇后，已用九个型款续添了九十多艘。中国海军固然不可能破题儿第一遭就选用较大型的潜艇，但既有信心能运用279吨的IIB型，为何不拣选续发展下去，仅多重十数吨的IIC型？强调只会选购IIC型而不肯接收已被淘汰的IIB型更是买家应有的态度。这等于清清楚楚地告诉卖家，这个买家是有备而来的，不是可以随便摆布的。对外国军火依赖性高并不等于该闭着眼睛去接受劣货。千辛万苦去增加两艘有可能成为问题舰的舰只是不负责任之

20 Conway 1922-1946, pp. 241-243; Möller and Brack, *Encyclopedia of U-Boat*, pp. 65, 67, 69-74, 96-98, 105.

举。这不是后见之明。这种不必冒的险，倘陈绍宽行前做够准备工夫（当时列强海军的基本资料并不难得），而本身又判断能力不差的话，绝对可以避免。可惜陈绍宽是个无备而往，任人宰割的买家。

出资让人家做的实验果然失败了。佳品变劣货，陈绍宽和周应骢责无旁贷。但近年所刊有关三四十时代中国海军发展史的书，对陈绍宽通常只有溢美之辞。那些书的作者对多时德国研制的各款潜艇毫无认识可言，这情况是不必强调的，因为研究中国海军史而对世界海军史有足够理解者全球只是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人而已。

即使陈绍宽和周应骢签约前肯做功课，结果亦不会有很大分别。关键在这两个采购大员的素质。

陈绍宽在欧采购的报告，迄仍未见²¹。周应骢则有称绝的直接纪录和间接纪录各一。

周应骢在其回忆录内说，他和陈绍宽“在意大利买了六条鱼雷快艇，订了一条鱼雷快艇母舰”²²。订舰虽不等于舰一定会造出来，但在西方来说，这是必有纪录之事。现在不仅未见这样的纪录，三四十年代的意大利海军本身连一艘鱼雷快艇母舰（motor torpedo boat tender）也没有²³。买了的东西更明确不过，不可能无端蒸发。中国海军哪有六艘意制鱼雷快艇？如果说意大利没有交货，这些快艇就该有曾为中国所购（或原为中国订制）的纪录。试看随后所说电雷学校在德订购而终不能来华的舰艇，艘艘的来龙去脉都够清楚，便可知周应骢信口雌黄了²⁴。

另一较间接的纪录见于一本虽采小说体，而实在是口述历史的陈绍宽传——周宏冰、方舟，《海军上将之恋——南京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纪

21 高晓星编，《陈绍宽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4年），是目前陈绍宽所写文字的唯一结集。书中没有记述此次欧行的文字。

22 周应骢（李蓬洲记），《海军生活见闻》，《文史资料选辑》，110期（1987年8月），页194。

23 这点不难从Roger Kafka and Roy L. Pepperburg, *Warships of the World*, Victory edition (New York: Cornell Maritime Press, 1946); Aldo Francaroli, *Italian Warships of World War II* (London: Ian Allan 1968); Erminio Bagnasco, *I Mas e le Motosiluranti Italiane, 1906-1968* (Roma: Ufficio Storico della Marina Militare, 1969); Erminio Bagnasco, *Le Motosiluranti de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Parma: Tuttostoria, 1977); Conway 1922-1946, 一类书籍中得到证明。

24 笔记者不可能替周应骢发明这种故事。回忆录之误应出于周应骢自夸功绩，欺骗读者。

事》（北京：海军出版社，1989年）。此书说陈绍宽在德洽商用小麦代替舰款之法换取三艘巡洋舰²⁵。这件天方夜谭式的事可以有两解释：（一）根本无其事。

（二）有此事而讲得夸张。任何一种解释都不会给陈绍宽和周应骢带来光彩。

如果本无其事，发明人就是周应骢，而非周宏冰和方舟（或者都是笔名）。何以这样判断？因为周宏冰、方舟二人的写作资料主要为访问周应骢和陈绍宽另一得力助手曾国晟（1899-1979，烟台海军学校第十三届，1921年经由吴淞海军学校深造毕业）七天的笔记（这点书的后记讲得很清楚）。曾国晟没有随陈绍宽去欧洲，所以向周宏冰、方舟二人讲述欧行事迹者只可能是周应骢²⁶。假如周应骢无聊到凭空乱说（虚报在意大利买艇订舰不正是这种玩意吗？），反映出来的不仅是他的人格，连陈绍宽的识人本领也成了问题。

要是果曾“洽商”，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更严重。向德国提出这样的要求足以暴露中国中央海军的领导人不知彼不知己的弱点，并不是把单方面提出来而对方绝不会回应的事夸张为互洽那样简单。

当日向德国提出以物换取三艘巡洋舰的要求的荒谬程度，不亚于现在企图换取一两艘美国航空母舰（尽管是快除役的）。申说起来要先讲明当时德国究竟有什么巡洋舰。

1937年间，德国拥有过万吨的重巡洋舰三艘，五六千吨的轻巡洋舰六艘。对野心勃勃，即要发动欧战的德国来说，这是只会嫌少的阵容。单和其最接近的假想敌法国比较起来，德国在这方面就显有逊色（那时法国有巡洋舰十九艘；万吨者三艘、九千吨者四艘、七千吨者九艘〔四艘成于该年年底，新得很〕、六千吨者一艘、五千吨者一艘、四千吨者一艘）²⁷。这还未把英国和荷兰的巡洋舰也计

25 周宏冰、方舟，《海军上将之恋》，页257。

26 抗战期间，曾国晟用翁仁元笔名出版了一本《抗战中的海军问题》（无地名：黎明书局，1938）（《海军上将之恋》用不短的篇幅去介绍这本书；此书现在已很罕见），在八十年代又写了一篇不短的《记陈绍宽》，《福建文史资料》，8期（1984年10月），页170-185，都不提陈绍宽赴欧购舰之事。不管曾国晟为何不讲这件陈绍宽一生经历中的重要事情，他两次有机会说而不说，起码可以证明他不是周宏冰、方舟讲陈绍宽在德国洽商用小麦换巡洋舰的史源。除非能够证实周宏冰、方舟二人胡言乱语，他们讲此事的史源就只可能是当日随陈绍宽赴欧的周应骢。虽然周、方二人的海军知识和域外知识同样肤浅（书中笑话连篇，如以为潜艇母舰也潜水，和说天主教教宗的孙子洗礼），但书中所记应主要出自访问陈绍宽两助手的谈话纪录。

27 德法两国在1937年时拥有巡洋舰的情形，见Conway 1922-1946, pp. 227-231, 262-266;